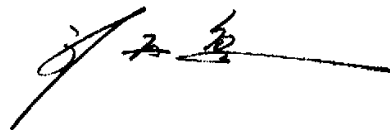


# 香港社會文化批評的命運



香港的主要報刊無論其思想傾向如何，都有包括着政治批評在內的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它的批評性輿論獨立而尖銳，對社會起着一種民間性的道德監督作用。但任何對政府過於坦率而尖銳的批評，都會影響到「資本家」的「生意」。務必請「自律」、「自重」，這首先是資本家們對編者、記者的哀求！可以預料，1997年之後香港的精神本體將因此而逐步削弱。

1995年秋冬之間我到香港後曾多次對報刊發表談話，預言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將在三個方面面臨考驗：(1) 是否能夠保持廉政？(2) 是否能夠保持高度繁榮？(3) 是否能夠保持民間道德監督系統——自由新聞系統(包括其他自由言論系統)。香港被視為「奇迹」並被世界所欽佩，正是它在上述三個方面均可引為驕傲。許多國家與地區，一繁榮就腐敗，一控制就無聲，一自由就失序，往往只能具備三項中的一項或兩項。而香港恰恰三項兼得，既有錢，又有序，又有聲，這是很了不起的。

我曾和一些朋友討論「香港的意義」。討論時我就發表了這樣的意見：香港的意義(對於中國和世界)是多重的，而多重中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就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廉政、高度繁榮、言論自由三者和諧統一的成功範例。這一範例說明在一個社會實體中同時實現經濟發展、社會健康、表達自由的可能性，即腐敗與思想禁錮並非繁榮社會的宿命。

香港為甚麼能夠匯集三種品格於一身？為甚麼能夠在一塊彈丸之地上創造出如此奇特的文明？這有其歷史原因(歷史機遇)、地理原因(亞洲心臟)、文化原因(中西文化匯流)和制度上的原因(英國管理制度)等等，而其中最關鍵的則是它有一個不受政府、黨派、意識形態所左右的獨立司法系統和一個同樣獨立於政府黨派和意識形態之外的文化批評與社會批評系統(包括政治批評)。也就

是說，香港的驕傲有兩個最重要的支撐點，一是它的法治本體；一是它的精神本體。

本體，即事物的根本。香港文化的根本，乃是它的自由而有效的政治批評、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這種批評的載體包括學校、社會團體講台、文學藝術等，而主要的載體乃是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所組合的自由新聞系統。近幾年來，常看到一些討論香港文化的文章，可惜多數文章都在討論香港文化的高低、深淺，是否屬於沙漠狀態、邊緣狀態等，言及的常常是一些並非十分重要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對香港精神本體——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的特殊價值、特殊功能和未來的命運，卻缺少關注以至把它排除在討論的中心位置之外。

我到海外之後，常常留心觀察香港文化，這才發現香港的主要報刊(除少數官辦或半官辦報刊外)，無論其思想傾向如何，都有包括着政治批評在內的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儘管其中有一些批評是瑣碎的，但多數是對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熱情關懷，態度嚴肅而坦率。這種批評的寶貴，從大陸走出來的知識份子看得最清楚。可以說，大陸報刊最致命的弱點便是缺少真正的政治批評、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由於大陸報刊的性質乃是黨政系統的宣傳工具和輿論工具，因此，它的總功能便是傳達和闡釋黨及政府的決策、政策和意圖，而不是對這些決策政策意圖進行質疑和批評。在這一總功能之下，大陸報刊也有社會反映與文化反映，但這些反映的基調又是謳歌性的，也幾乎沒有質疑與批評，如果有一點，也是局限在官方宣傳機構允許的範圍內，它不可能對政府的決策及其政治運作起真正的監督和制衡作用，也不可能對政府的腐敗和社會的惡質化起真正的遏制作用。因此，大陸報刊的精神本體乃是長官意志和法定政治意識形態，而不是起着民間道德監督作用的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

與大陸報刊的性質、功能不同，香港報刊所負載的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卻是真的。它的批評性輿論獨立而尖銳，它的鋒芒直逼香港政府和與香港相關的大陸、台灣政治體系。在批評中，影響它的行為的不是政府的指令，而是文化主體(記者、編者、作者)不可扭曲的絕對道德律令，這種律令使他們只能面對事實與自己的良心。因此，它便形成一種具有獨立力量的精神本體。

香港文化因為具有這種精神本體，所以體現這種本體的報刊如《信報》、《明報》等便在香港的公眾中擁有很高的威信並深刻地影響着社會生活。它們既是公眾的眼睛、耳朵與喉舌，又是政府的鏡子、警鐘和負責任的反對派，因此，它們便對社會起着一種民間性的道德監督作用。這種監督，乃是使社會生態獲得平衡的一種巨大調節力量。近年來，海外中國知識份子熱烈討論的「公眾空間」，在香港就很具體地表現在這些報刊上。我在〈香港漫筆〉的短文中，列舉了幾種最能體現香港文化精神的項目，其中名列首位的便是查良鏞、林行止的政治批評與社會批評，除了這兩位之外，活躍於香港的著名報刊主編和作者，如側重政治批評的羅孚、陸鏗等，側重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的戴天、胡菊人、董橋等，也構成香港文化本體很有代表性的部分。此外，一些在西方的著名教授，如余英時、劉紹銘、李歐梵、鄭樹森等，也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批評與文

化批評，他們的思想與文字也化入香港的文化精神本體之中，這可能是他們始所未曾料及的。

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香港的精神本體是否還能繼續存活下去並對香港的面貌繼續產生影響？這是香港內外的中國知識份子最為關注的問題。

有些朋友認為，1997年之後，香港的自由新聞系統即將瓦解，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即將消亡。我則認為「未必」。中國的領導者雖然很難接受香港的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如果能接受，他們就會允許香港報刊進入大陸），但是他們也知道，要保持香港的廉政與高繁榮，沒有民間道德監督系統的調節是不可能的。因此，允許香港新聞系統保持一定的自由度，乃是保持香港現狀所必須的。何況，自由新聞系統的不變，乃是香港「五十年不變」的一面鏡子，他們還不至於很快就拋棄自己的諾言。正因為這樣，在本世紀末和下個世紀初的一段歷史時間中，香港的精神本體還不至於完全消亡。也因此，在這一段歷史時間中，中國政府還是不能允許香港的主要報刊自由地進入大陸。如果允許進入大陸，那只有兩種情況，一是香港的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變質，被大陸意識形態所同化；二是大陸政策發生根本性變化，開放言論，歡迎包括政治批評在內的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

存在並不等於發展。可以預料，1997年之後香港的精神本體將逐步削弱。這種削弱，不一定是因為中央政府可能發出種種限制的禁令，而是因為它畢竟生活在新的政權條件下和新的意識形態的「陰影」下。在新的條件與「陰影」下，且不說政治影響，僅僅心理影響就會使許多報刊的筆調發生微妙的轉換。原有的鋒芒與豪氣，特別是敢於批評中國政府的鋒芒與豪氣，將會逐步軟化。

即使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新聞系統和它負載的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不作任何干預，香港精神本體逐步走向式微也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香港的自由新聞系統固然表現出相當正直的文化力量，但它的基礎畢竟是脆弱的。它們都不能不立足在「經濟價值規律」的基石上，也就是說，他們一方面要依據道義原則辦報，另一方面又要依據利益原則（市場原則）辦報。報刊的中、下層編輯記者可以不顧丟失飯碗而忠實於自己的良心，而報刊的上層特別是「養活」報紙的「資本家」則不能不考慮到資本的盈虧和報業的「破產」問題，而經濟利益的考慮又不能不影響到政治傾向的選擇。1997年之後，任何一個準備在香港長期立足的「資本家」，都不能不考慮他背後的一個龐大的市場和掌握這一市場的強大的政府。在他名下的報刊上，任何對這一政府過於坦率而尖銳的批評，都會影響到他的「生意」，這種心態就不能不影響到報刊批評的聲音。務必請「自律」、「自重」，這首先是資本家們對編者、記者的哀求：別太過火，以免破產！可是，這種「自律」之聲卻發出一個重要信號：讓香港引為驕傲的精神本體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1997年之後，它將進入雖還存在但將逐步式微的白銀時代。